

山
昆
三
贤
丛
书

陆林 吴家驹 选注评析

朱柏庐诗文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

昆山
三贤
丛书



陆林 吴家驹 选注评析

朱柏庐诗文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



I 24.52/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柏庐诗文选 / (清) 朱柏庐著; 陆林、吴家驹选注评析.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10

(昆山三贤丛书)

ISBN 7-80643-754-1

I. 朱... II. ①朱...②陆...③吴... III. ①古典
诗歌—作品集—中国—清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
—清代 IV. I21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4703 号

朱柏庐诗文选(昆山三贤丛书)

著 作 者 朱柏庐 著 陆 林 吴家驹 选注评析
责任编辑 倪培翔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豪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8
印 张 21
印 数 1—3500 册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754-1/I·182
定 价 66.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朱柏庐先生像

清同治九年新阳（昆山）县令廖纶手书《治家格言》拓本

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闔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母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儉約宴客切勿留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勿營華屋勿謀良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妾嬌非閨房之福奴僕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豔妝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期質樸訓子要有義方勿貪意外之財莫飲過量之酒與有挑貿易母姑便宜見貧苦親鄰須加溫恤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倫常乖舛立見銷亡兄弟叔姪須分多潤寡長幼內外宜辭嚴法肅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重實財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擇佳婿母索重聘娶婦求淑女勿計厚賸見富貴而生詭容者最可恥見貧窮而作驕態者賤甚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母恃勢力而凌逼孤寡勿貪口腹而恣殺牲畜乖僻自是悔誤必多頹惰自甘家道難成狎昵惡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則可相倚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題當忍耐三思因事相爭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再想施惠無念受恩莫忘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慶不可生妬忌心人有禍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家門和順雖饗不繼亦有餘歡國課早完即囊橐無餘自得至樂讀書志在聖賢非徒科第為官心存君國豈計身家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為人若此庶乎近焉

巴江廖綸敬書

石印本五字一行字數與原稿無異惟原稿有朱柏庐先生手書四字此拓本無之且原稿有同治九年新陽縣令廖綸手書六字此拓本亦無之

朱柏庐像

顾沅辑、孔继范绘图《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像赞》，道光石刻，民国三十五年重拓本。

皇清家士私謚節孝先生朱公用純

柏廬高士
隱居獨學
宗經著述
淵源濂洛



柏廬外集

《津河广仁堂所刻书》本《柏庐外集》扉页，光绪八年刻。

母欺錄

崑山朱用純柏廬著

余於酬接時或所言或被問往往道述時事既非吾分內事且未必所聞之有據不亦妄乎自後切戒

小人有畏人非議之心則其爲不善也無力君子有畏人非議之心則其爲善也亦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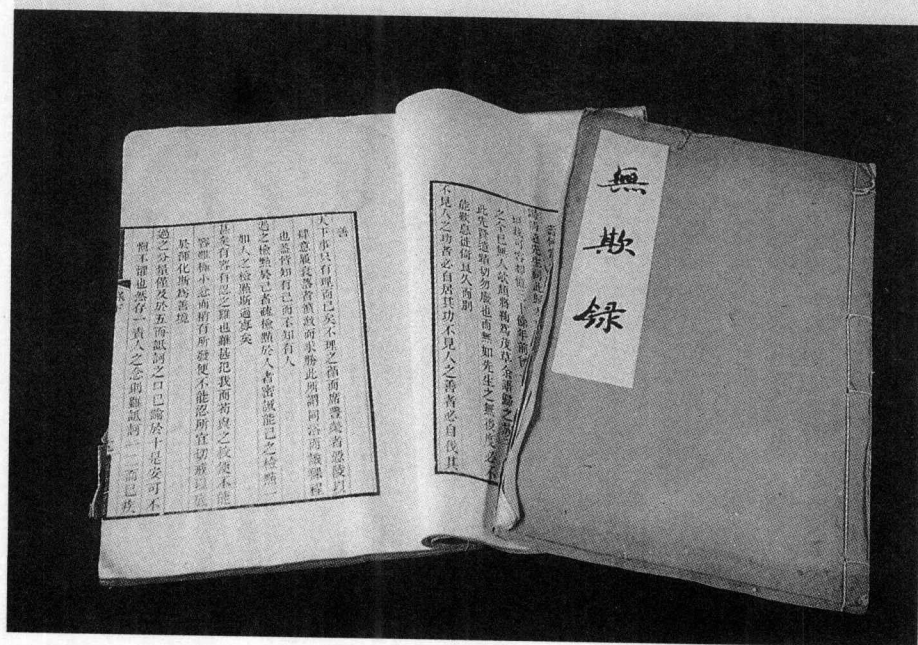
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謝文節引之以却胡元之聘然正須有壁立千仞百折不回之操始可語此不然其去笑罵由他笑罵好官自我爲之者幾何矣

人必欲自見其是是大病處

中矣

同治十三年(1874)常熟顾湘辑
《小石山房丛书》本《毋欺录》

《毋欺录》书影



民國十六年

愧訥集

崑山保管祠產委員會敬贈

民国木活字印本《愧訥集》扉页

《愧訥集》书影



《昆山三贤丛书》工作委员会

主 任 王竹鸣

副主任 钱解德 王文元

委 员 陈 益 姜小青 金晓春 倪培翔

张惠英 郭宝林 王金春 王明儿

《昆山三贤丛书》总序

张雷

昆山是一座古老而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早在五六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在这片膏腴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春秋时期,吴王寿梦曾在城西卜山下豢鹿狩猎,使昆山有了“鹿城”的美称。玉出昆冈,钟灵毓秀,我们只要想一想“昆山”地名的来历,就可以明白,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物华天宝之地、人杰地灵之乡。仅明清时代,昆山就诞生了归有光(1507~1571)、梁辰鱼(1519~1591)、顾炎武(1613~1682)、龚贤(1618~1689)、朱柏庐(1627~1698)等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学家、戏曲家、思想家、书画家、教育家。作为“百戏之祖”——昆曲艺术的发源地,昆山对于中国的戏曲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中国昆曲艺术被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先辈们创造的精神财富,直到今天仍让我们引以为荣。

昆山三贤顾炎武、归有光、朱柏庐是光耀中华史册的杰出人物。顾炎武一生漂泊南北,终生未仕,毕其精力深究政事,关心民疾,埋头治经,重于考证,开启清代朴学新风,不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术大师和爱国学者,而且还是文坛卓有成就的诗人和散文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感召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激发起华夏民众强烈的爱国情感。归有光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其文被黄宗羲誉为明文第一,尤其是那篇情真意切的《项脊轩志》,更是成为传世名篇佳作。“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这一脍炙人口的名句,出自朱柏庐的《治家格言》。这位一生潜心于传统教育的平民教育家,怀着振兴心智的满腔热情,居乡教学,知行并进,躬行实践。而他的那些劝人勤俭治家、修身养性、读书明理的格言,也正一代代相传下去。

文化,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是与经济、政治乃至科学技术紧密相连的。今天,在经济上开放度很高,吸引了上百亿外资的昆山,正以更实的措施、更大的干劲、更快的步伐,确立新标杆,增创新优势,实现新跨越,向着富民强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迈进。当昆山的经济国际化不断加速推进之际,文化的开放与交融已势在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昆山建设文化特色市的时机已经到来。

如今在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化融合的进程中,顾炎武、归有光、朱柏庐三位先贤的遗迹深深地印记在鹿城腹地,从传统意义上的纪念馆到开放式街心花园那一座座意境深远的场景雕塑,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三贤精神,已深深融入昆山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中。不仅如此,文化界的同志们还组织力量,策划编选了这套《昆山三贤丛书》,精选了顾炎武、归有光、朱柏庐的诗文作品,加以校点注释评析,供大家欣赏阅读和研究。应该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能使我们每个生活在昆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三位先贤的代表作,并从他们的精神遗产中汲取营养。尽管他们生活的环境与今天差异很大,然而这些作品中所散发的思想和艺术魅力,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建议我们的教育部门把“三贤精神”纳入学校的素质教育中,同时也建议我们的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读一读这套书,更希望作为三贤后人的昆山人民要对昆山深厚的历史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原有的积累,还要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充实自己,壮大自身。千万不要因为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遗产而沾沾自喜,即使有很多老本也总是会吃完的。只有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接纳八面来风,我们这个富有改革精神的城市才能变得更加蓬勃壮大、气势恢宏。也只有这样,昆山才有可能在今后的日子里出现更多的新“贤”,出现更多更优秀的文化成果。

《昆山三贤丛书》的编者让我为之作序。写下这段文字,与诸位共勉。

2002年8月

前言

在当今中国文化界,提起清代初年的朱用纯,略知一二者亦少;而说到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开篇的朱柏庐《治家格言》,则耳熟能详者甚众。本书编选介绍的,便是这篇著名古代家训的作者所写的文章及诗歌。

明天启七年八月,熹宗皇帝死,其弟即位为思宗(明年改元崇祯)。是年亦为后金(即清)太宗皇帝天聪元年;皇太极虽较明思宗早逝一载,却是三百年明王朝的直接掘墓人。该年四月十五日(1627年5月29日),在南直隶省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一位普通儒士朱集璜的家中,其长子出生了。集璜为之取名用纯,字致一,大约是希望他对儒家经典用心纯粹、致力专一。

朱集璜(1597—1645),字以发,明崇祯二年(1629)入复社,八年(1635)贡生,学行为乡里所推重,教授弟子数百人。其姓为昆山望族,人称“玉峰朱氏”。集璜祖辈曾任一般官吏,父亲家佐无功名,至集璜已是门庭衰落,以口播笔耕砚田为生。用纯六岁时启蒙就傅,当时父亲在长洲徐汧(1597—1645)家设教,遂从之读朱熹《小学》。崇祯十六年(1643)年方十七岁,即补诸生为秀才。虽比顾炎武、归庄年十四即为诸生要略晚,但较之于复社领袖张溥、吴伟业十九、二十岁始得此,亦算是少年初成、才气英发了。正如其晚年回忆所云:“是时意气伟然,指顾高远,不离骤致,若巍科上第近在足下然者。”(《甌斋陶表兄像赞》)

就一般标准而论,朱用纯当时的家庭生活是安定的,人生道路是顺畅的:父亲先后教授数百人,养家糊口自然无虞;十七岁为秀才,功名前景应该光明。即便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下京城、思宗自缢死,普通人的生活仍在继续着。远在江南的朱用纯正是在此年与本县诸生陶琰(1597—1645)之女陶端结为夫妻。如不是次年

发生的人生惨变,历史上可能就不会有家喻户晓的朱柏庐了。

崇祯十七年亦即是清世祖顺治元年,明思宗自尽后两个月,清兵入北京而明亡;同时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史称南明,故此时江南仍然算在明朝治下。顺治二年五月,清兵陷南京,昆山闻讯而谋议抗拒,朱集璜率众弟子举兵守城。清兵以三十万众、数十大炮,载以巨舰,蔽空而下。七月六日城破事败,集璜书绝命词于衣带间,词曰:“可质祖宗,可对天地,生无自欺,死复何愧!”遂投东禅寺后河而死,门人孙道民等不屈死者五十余人(《昆新两县志》卷二四《忠节》)。城溃后,清兵屠城三日,“总计城中人(死于)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缢者十之二”,全县共死难二万四千餘口(县志卷三九《纪兵》)。在清兵征服江南的铁血过程中,昆山人民奋起反抗和遭受镇压的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见诸史册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三次被屠,亦是死亡二万余人),这是一段不应忽略的历史。

父亲不满五十而死于非命,对用纯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是时,“丧乱迭乘,山颓海沸……覆巢之下,几无完卵”(《甓斋陶表兄像赞》)。作为长子,既要侍奉寡母,又要抚养弟妹(二、三弟皆幼,四弟为遗腹),可他自己也才十九岁!欲从亡父于地下而情势不能,为贍母持家而勉强挣扎于乱世,对此他有深深的自谴:“恶德过于山积,不复可以为人!”(《答李映碧书》)

对于用纯来说,父亲因殉难而死,自己却残喘而生,是他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和伴随终身的情感隐痛。从此“自比王袁庐墓攀柏之义,自号曰‘柏庐’”(彭定求《朱柏庐先生墓志铭》),其创巨痛深的内心世界便已昭然被揭了。王袁为三国魏人,其父王仪被司马昭冤杀,他“痛父不以命终”,遂“绝世不仕”,长年“立屋墓侧,以教授为务。旦夕常至墓前,拜辄悲号断绝。墓前有一柏树,袁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树色与凡树不同”(《三国志·魏书·王脩传》),这就是“庐墓攀柏”的本事。朱用纯借“柏庐”以为号,在表达对亡父不尽孝思的同时,也寄寓了抗清死难之士的后代不事新朝的遗民之志。其后五十年的感情之旅和人生之路,在取号柏庐的这刹那间便已定格:茹哀饮痛,避世

隐居。

纵观朱用纯弱冠后五十年经历,固然可用以上八字来概括,但结合其生活和著述,似乎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青年:自顺治二年(1645)至十四年(1657),即其三十一岁以前。

此段时间之初,用纯虽然遵遗命、弃儒冠,但并未放弃对学问的追求。他垂暮时曾回忆五十余年前向明诸生夏永言问学,“茆茆残地,喔喔鸣鸡,朗吟不辍,促席相随,非一朝之荣名是勉,乃千秋之志节为期”(《愧讷集》卷八《祭夏师文》),描述的正是自己二十余岁时抱恨攻苦的情景。而内心的愤懑情怀,则时常借诗词创作而抒发,即所谓“早婴多难,坎壈韞结,无如何率尽托诗余以发之,日尝得一阙”(《愧讷集》卷三《叶九来诗余序》)。每日作词一首,情绪之激愤、哀思之泉涌,可以想见。

由于城破家难之后,全家“脱身兵火之中,备极流离艰苦”,家产荡然无存,以至于“箸头几脚靡有遗者”(《先室陶氏事略》)。为了养家糊口,只得以“授徒贍母,下抚弟妹”(《朱柏庐先生编年毋欺录》),约从二十四岁时开始至人家为塾师(《毋欺录》顺治十六年有“十年以来授餐馆舍”云云)。家庭塾师这一角色身份,是家境贫寒而又不愿依仰的明遗民最普遍的一种职业选择。

这十馀年间,所作诗文传存甚少,词则一首未见。在三十一岁那年,应明崇祯进士、翰林编修徐开禧之请,为所撰《两闾杂记》作序(《柏庐外集》卷三)。徐氏在明末曾先后为湖广、福建乡试的同考和主考官,该书即记其有关经历。尽管开禧入清已辞官归隐,但作为出身翰林之人,以清华高贵之身,而请一前朝小秀才、现今落魄布衣作序,此事似可说明:至而立之年时,用纯已在当地崭露头角了。

中年:自顺治十五年(1658)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顺治十五年开始,是因为其重要学术性著作《毋欺录》始撰于该年。

《毋欺录》或名《无欺录》,如按旧时四部法分类,归子部儒学类性理之属。这是一部持续四十年、几乎是用自己一生履践去撰写的书(直至去世之年始搁笔),按年记录作者对理学道统、世道人心、伦理

教化、时弊民瘼的认识和关怀,是一种集哲学思辨、道德劝勉、人生感悟、谈史论文于一身的笔记体学术杂著。其邑后人潘道根(1788—1858)认为“读是书,觉先生平日进德修业、省身克己、处事接物之要,俱在焉,必阅全本、原本,然后可见其无一事放过、无一事错过”(《读〈毋欺录〉管见》),即是指出其自我道德修养言行记录的内容特点。该书首条所记,是同乡友人、遗民顾升辅语:“今日世道恶薄,吾辈只是立身行己处著力,正厚自益尔。”不仅点明全书之旨是以程朱理学针砭世风、律己劝人,而且标志着从此走上钻研理学的道路。自所谓“年益进、所读之书日益广”,认为词曲创作非“君子之所期学乎古人者”,于是“废向所作,绝不复事”(《叶九来诗馀序》),当起始于此时;世所谓其“始于志节、成于理学”(《朱柏庐先生墓志铭》),亦当滥觞于此际。他并于次年发誓:“自今日立志始,不复攻不急之业,不复犯贪多之病,惟经惟史,惟勤惟专。有不然者,先圣先贤其降之罚!”(《毋欺录》)顺治十六年)清代虽由此而少了一位以诗文著称的纯粹文士,却多了一位执著以程朱理学抨击明末清初世风和士风的倔强儒者。

大约至康熙初年,朱用纯的道德文章皆大进,在昆山已有很大影响,“邦人重君之德,争设席以延君”为师(杨无咎《朱柏庐先生传》),以至因不能遍应诸人所聘,遂设馆于家,从学者日益众。过去作为赴馆之塾师,他固然不能不以举业文字教人,但对此种“舍德行而趋文艺”的科举“取士之弊”,尤其是明代“专用八股一科”(《毋欺录》顺治十六年)对国家民族之祸,他是耳闻目睹的;同时,身为遗民,他还有自身独特的烦恼和惆怅:“今之所以立教者,时义也;而时义之所以致用者,应举也。余既脱弃儒冠,绝迹科目,则亦不复于时义中研虑覃精,以求其故,而犹高据函丈之座,指挥论列,无乃求者齐语而授者楚语耶?”为了补偏救弊,只能时以“立心之诚伪、行己之是非、交友之邪正、应事之得失,谆谆为学者分别而晓畅之”,但无奈聘者“意不重是也”(《毋欺录》顺治十五年)。其中,既有欲行素质教育与必行应试教育之苦恼,亦有自己则绝迹科目与教人则求取功名之矛盾。如今在家开馆,“有志者盍顾我乎?”遂以讲论儒学道义为重。凡来学者,必

先授以朱熹《小学》、《近思录》为入门之阶，举业外另设讲学，“阐发书义，商榷经史”（《朱柏庐先生墓志铭》），无论严寒酷暑，讲论终日无倦容。用纯教徒，不仅关心其学业，而且注重其道德，但他“律己甚严而责人以宽”，故使人易于接受而悦服者众。人称“当是时，玉峰夫子之门彬彬然可观矣”（《朱柏庐先生传》），他是欲以一己微弱的道德力量，试图挽回颓败世风于万一。

然而，随着声望日隆、享誉乡邦，也给用纯带来意想不到的痛苦和麻烦：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诏令内外官员荐举各地参加博学宏词之试的人选，远在山东为官的乡人叶方恒自作主张，推荐朱用纯。这在企求闻达者是天大的喜事和荣幸，而对于矢志不事新朝的遗民来说，则无异于逼其自毁节操。用纯闻讯，“以死自誓”（《朱柏庐先生传》），并囑时为顺天乡试解元的弟子王喆生（1648—1728），“自后凡有齿及仆（自己的谦称——引者按）一字者”，均请告之曰“伊人也，怪迂之士，动与时违，而不必置之胸臆也者”（《柏庐外集》卷二《与王醇叔》之三），事始得免。有鉴于被荐之事，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九月，他于病中撰文以自绝于当世：“……年少多难，颇逃于诗酒文翰，以自冥忘。旋觉习也非学，去圣域甚远；于是雅志为己，欲绍前修。然读书不能措诸实践，求道不能得其阃奥，軫怀济世而先不能自善乃身。特以资本忠信，兢兢焉耻作伪。一生操行，如是而已。无可传，虑交游有言之溢美者，故自传。”（《愧讷集》卷九《朱布衣自传》）时年五十六岁。

晚年：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三十七年（1698），享年七十二岁。

康熙二十二年秋，朱用纯应吴县席永劼之邀，赴洞庭东山（今苏州东山镇）教其幼弟永渤（1669—？）。席氏父启图（1638—1680）乃东山著名大户，富甲一方而好礼崇贤，康熙十六年曾聘理学名家陆陇其为其塾师，所辑先贤嘉言懿行《畜德录》，即陆氏手定。东山远离尘嚣，僻处烟波浩淼之太湖深处，甚合用纯“埋迹于此，不使人知我名氏、识我面目为幸”（《许致远诗文序》）的主观期盼，遂欣然而西去，开始了

长达十年左右的执教席家的安定生活。平生寡朋交，至此与当地贤人隐士多有来往；平生少游历，至此遍览太湖山水风光。其文集中许多精彩文字，尤其是为数不多的几篇游记散文，便主要是写于此时此地。席永渤康熙三十年(1691)前已补诸生，大约在此后不久，朱用纯返回昆山，继续其授徒生涯。直至七十一岁那年，病患“多端”、诸症“加剧”，知情的友人皆言是“过用心、太耗气所致”，而劝其“以阅文讲书为戒”。用纯亦自知仍任馆职为不自量力，但认为做塾师亦自有其职业道德：“既任之而不终其事，或终之而苟且塞责：均为有负神明。”(《毋欺录》康熙三十六年)次年，即清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初七(1698年5月16日)，朱用纯病逝于家。据“候疾侍侧”之弟子言，病革之际曾“朗吟”陆游《示子》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吕廷章《柏庐先生像赞》)；又据为其撰墓铭、写志传之友人言，临终时尚念叨“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语毕目瞑。足见其不忘故国之志节与克己修身之理学，未尝一日分离，即便此时早已恢复无望，早已是新朝日隆了。

朱用纯一生著述甚丰，有《四书讲义》(今存《大学中庸讲义》三卷)、《删补蔡虚斋〈易经蒙引〉》十二卷(原作为明代蔡清撰)、《春秋五传酌解》(以上为经部)、《毋欺录》三卷(今存多种版本)、《迁改录》、《困衡录》(以上为子部儒学类)，文集则有《多败集》、《愧讷集》十二卷(今存多种版本)、《柏庐外集》四卷(今存光绪八年刻本)等。

作为一位理学家和教育家，他不以诗文创作为事业追求，“其诗文翰墨流衍散佚，先生谓非儒者要义，每过而不留”(《朱柏庐先生墓志铭》)，既有所作，亦不珍惜。身为理学家，他把明朝之亡、世道之丧，皆归因于不知敦礼尚义，上至君王，下至士绅，人人有份：“使后人主知有尽贵斯民之道在乎敦礼尚义，而举世之人亦争以此为贵，不倾心夫爵位荣宠，则宇内何至有陆沉之祸哉！”(《毋欺录》顺治十六年)针对明末的世风和学风，用纯主张弘扬程朱理学，对此后的陆九渊(1139—1193)、王守仁(1472—1529)的正心为本而“流入异端”，陈献章(1428—1500)的静坐“流弊未有不入仙佛”，以及同时之黄宗羲

(1610—1695)的宗良知之学“更偏而隘”，均有所批判(参《毋欺录》康熙二十四、二十三、二十九年)。认为只有以“修身为本”，才能做到“物于是为真格，知于是为真致，意于是为真诚，心于是为真正”；如果不“靠着圣贤经传做去”，是很容易“以学术杀天下”的(《毋欺录》康熙二十四年)，充满着对明末清初学风与士风的批判精神。

朱用纯所处的是一个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卑污社会：“今举世之人，汲汲津津，所事者惟功利，所尚者惟富贵。其于人之所以为人、三纲五常之道，莫之或讲也。然求富而富不至、求贵而贵不得者，何限？乃至饥寒困踣，流离失所，人卒莫指而斥之曰：‘夫夫也，非人也！’若其不习于德，不轨于义，纵欲忘亲、奸欺误上、暴横残贼、虐己害人者，则群相排弃之曰：‘甚矣，夫夫之非人！’”但是身为教育家，他并没有丧失希望，反而从民众对恶行薄俗的指斥中，看到了天理之所在和人心自向善：“以此而观，则天理之未尝泯灭，而人心之未尝一日亡也，犹信！”(《毋欺录》康熙六年)为了挽回世道人心，他主张脚踏实地，从日用常行做起，以普通百姓为对象去立言设教，“下学而上达，上达即在下学中……学之必不可不进于上达，而教之必不可不主于下学也：盖圣人只是下学中也”(《毋欺录》康熙二十八年)。所撰的“贵贱尽可遵行”的《治家格言》和以“做一乡党自好之士”为指归的《劝言》，便是此种思想的产物。至于如何去钻研圣贤学问，他反对空谈理论，提倡付诸实践，通过日常言行的格物致知来变化气质，显示出实践理性的色彩。

在文学观上，从文化学术的广大范围看，朱用纯认为，与儒家经典相比，海淫海盗的“小说杂剧”自是“亟宜焚弃”，即便是诗词歌赋“亦为缓事”(《劝言·读书》)。这种观点固然表现出理学家的狭隘性，但是如果考虑到这只是就普通民众而言，考虑到明末清初淫秽之书的泛滥，其中应该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如是文士，尤其是具有创作才华之人，则又另当别论，因为“《诗》、《书》、六艺，圣门之所不废”也(《与唐履吉》)，故其文集中并不乏谈诗论文之篇。如就文学谈文学，在文学的功用上，他主张“文章要期有用”，具体说，“或指示以垂教，